

《词综》编纂与明清易代学术思潮关系考论

祝东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32)

摘要:《词综》在中国词学史上通常被视为清代浙西词人开宗立派的标志, 但它的编纂实际上与明清易代之际存经存史、保留故国文献的学术思潮密切相关。朱彝尊等人在《词综》编纂过程中以严肃认真的态度, 运用考证经史的汉学方法来选订词人词作, 给一向被视作小道末技的词学树立了研究典范, 对清代词学研究学术规范的建立产生了深远影响。《词综》成书推动了古代词学研究的学理化进程, 在词学学术史上涂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关键词: 朱彝尊; 《词综》; 学术史; 清代词学; 词选

中图分类号: I207.23

文献标志码: A

《词综》是清初一部大型通代词选, 朱彝尊等人为编选是集, 先后花了八年时间, 参阅了《花间集》《花庵绝妙词》等十余部词选, 《百川学海》《古今小说》等多种丛书, 综及各家别集乃至野史笔记等大量文献史料, 成书二十六卷, 后又增补十卷, 共计三十六卷, 收唐、宋、金、元词作 2 253 首 (卷十一王十朋《点绛唇》与卷三十一重复, 实为 2 252 首词作)。

《词综》的编纂, 与明清易代之际回归六经、重视实学的学术思潮关系密切, 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文学选本。它的成功编选, 不仅被清代词学界奉为创作圭臬, 而且为清代词学的研究树立了典范, 加速了清代词学研究的学理化进程, 在词学学术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试析如下。

一、《词综》编选与明清易代“存经存史”的学术思潮

朱彝尊因其词学成就而流芳文坛, 彪炳史册, 尽管他在《清史稿》中归入“文苑卷”, 但是就其个人旨趣而言, 主要在于尊经重道发扬儒学。据史料记载: “朱彝尊, 字锡鬯, 秀水人, 明大学士国祚曾孙。生有异秉, 书经目不遗。家贫客游, 南逾岭, 北出云朔, 东泛沧海, 登之罘, 经瓠越。所至丛祠荒冢、破炉残碣之文, 莫不搜剔考证, 与史传参校同异。归里, 约李良年、周筮、缪泳辈为诗课, 文名益噪。”^{[1]13339} 他出云朔, 泛沧海, 登之罘, 经瓠越, 考证碑文, 参校史传, 行为与清初遗民顾炎武毫无二致。易代之后, 终因生活所迫, 参

收稿日期: 2022-01-06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视觉修辞的理论、方法与应用研究”(17ZDA290)

作者简介: 祝东(1982—), 男, 湖北孝感人,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化与符号学研究。

加了康熙十八年（1679）的博学鸿词科，拔为检讨。入仕之后，参编《明史》，并曾编著《经义考》（三百卷）、《日下旧闻》（四十二卷）等经史著作。晚年归里，游艺词林，文名愈盛，也没有放弃经史研究。朱氏在康熙四十四年（1705）以七十七岁高龄迎驾康熙，进献《经义考》《易书》等作，得到康熙赞赏，对供奉查升说：“朱彝尊此书甚好，留在南书房，可速刻完进呈。”并以“研经博物”四字匾额赐给朱彝尊^{[2]555}。因此，纵观朱彝尊主要生平精力，是以从事经史研究为主导的。当代学者毫不吝啬地给他冠上“经学大家”“史学巨擘”的名号^{[3]249-257}，应是符合朱氏生平实际的。即便是让朱彝尊文名大噪的《词综》选本，也是与当时存经存史学术思潮不可分的。

《词综》的编纂与明清易代之际存经存史的学术思潮相应合。顾炎武在《日知录》里有一段关于“亡国”与“亡天下”的辩论，其云：“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4]756}在顾氏看来，异姓王朝改弦更张，此亡国之谓，这只是关系到统治阶层利益的变换，而亡天下则是文化命脉的切断、民族的灭亡，比亡国更为可怕。按照明清易代之际的民族观念，满洲贵族入主中原，于汉民族来说，是神州陆沉，这不仅是“亡国”，更是“亡天下”。在历史长河中，一个民族的王朝被另外一个民族的王朝取代时，总有一些有识之士希望通过保存故国文献来保存文化命脉，使其不至于“亡天下”。如元好问在元蒙灭金之后，编选金源^①一代文人诗词曰《中州集》，其目的则是为了保存故国文献，如《中州鼓吹翰苑英华序》中所言：“亦念百余年以来，诗人为多，苦心之士，积日力之久，故其诗往往可传，兵火散亡，计所存者，才什一耳。不总而萃之，则将遂湮灭无闻，为可惜也。”^{[5]1}其存史的目的显而易见。此书在体例上，将每位作家都列一小传，介绍其人生平事迹，评论其诗文艺术，辩论历史事实。金源一代之诗大部分幸赖此书得以保全，元氏亦通过此书实现了以诗存史的目的。这一点在明清时期，已为共识，如天启初年，程嘉燧就曾对钱谦益曰：“《中州》之诗，亦金源之史也。”^{[6]2}明清易代时期，钱谦益仿效元好问而辑《列朝诗集》，选录明代二百余年两千多名诗人之作，于诗人亦撰扼要小传，存诗存人，不仅保存了有明一代文献，而且各家小传也为后人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史料和线索，成为现今研究明代文学的必备文献。朱彝尊晚年亦曾编辑《明诗综》，此书共一百卷，辑录了明代三千四百余名诗人的作品，由洪武以迄崇祯，历朝诗人大致网罗无遗。朱氏亦给入选诗人各作一篇小传，并分载诸家评论，朱氏评论载于最后，目的是存诗存人，“或因诗而存其人，或因人而存其诗，间缀以诗话述其本事，期不失作者之旨。……庶几成一代之书，窃取国史之义，俾览者可以明夫得失之故矣”^[7]。可见以诗存史，存诗存人的思想并非朱氏一时性起，

而是时代之共识。

不同民族王朝易代之后，有识之士往往通过保存文献史料的方法来保存故国文化不被灭亡，这种思潮化及词学领域，使得一向不为人注意的“小词”也被文人重视保存，期望达到存经存史、保存文化之用。清初“词史”说的提出，也正是受到明清易代存经存史、保留故国文献学术思潮的影响^[8]。然而，由于词体文学体格卑下，欲以词存史，则首先需要提高词体文学的地位。朱彝尊在《红盐词序》中指出：“词虽小技，昔之通儒鉅公往往为之。盖有诗所难言者，委曲倚之于声，其辞俞微，而其旨益远。善言词者，假闺房儿女之言，通之于《离骚》、变雅之义，此尤不得志于时者所宜寄情焉耳。”^{[9]453}叶嘉莹考证此序大概作于康熙十年（1671）左右^{[10]118}，《词综》正在编纂之中，尚未成书，其中将词比之如寄情之诗，同于骚雅，实际上认为词与诗具有同样的文学地位；逮至康熙三十年（1691），三十六卷本《词综》完成，此年稍后，朱彝尊以浙派宗主的身份序曹溶的《静惕堂词》时又明确指出：“念倚声虽小道，当其为之，必崇《尔雅》、斥淫哇，极其能事，则亦足以宣昭六义，鼓吹元音。”^{[11]99}这两篇词序的中间阶段也正是朱彝尊等人编选《词综》之时，朱氏这里极力抬高词的地位，认为诗词同功，自然有其特殊的用意。如果再将朱彝尊在《斋中读书》十二首中所言的“诗篇虽小技，其源本经史”结合起来看，词同与诗，诗源于经史，这样理解存词背后的意味就更明显了。柯崇朴在《词综后序》就曾进一步指出他们编纂《词综》的意识在于：“间欲窥其寄托，致其抑扬，求如元遗山之《中州集》、钱虞山之《列朝诗选》序例，实惭谫陋，有所未遑。”^{[12]4}即是在词学领域内也像《中州集》《列朝诗选》一样对汉民族文献进行保留，惜之少有论者注意这句话的含义。因此笔者以为，《词综》的编纂实际上易代之际存经存史的学术思潮的反映，与其说朱彝尊等人是为了创立词派，不如说是为了存词存史；或者说其主观愿望是为了保存词学文献，而客观上促使了浙西词派的形成与发展。这个与张惠言编纂《词选》及周济辑《宋四家词选》对比审视则会更为明显。

《词选》系张惠言与其弟张琦于嘉庆二年（1797）在安徽歙县金榜家坐馆时，为了指导后学习词而编选的一部词选。此张琦《重刻本词选序》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嘉庆二年，余与先兄皋文先生同馆安徽金氏，金氏诸生好填词。先兄以为词虽小道，失其传且数百年；自宋之亡而正声绝，元之末而规矩隳，窳宦不辟，门户卒迷。乃与余校录唐宋词四十四家，凡一百十六首，为二卷，以示金生，金生刊之。”^{[13]1}而通观张皋文一生的文学活动，虽然偶亦填词，但弄笔不多，存词仅46首；此外只有《词选》一书与《词选序》及相关评语，其它皆与词学不相关联，可见词学并不是皋文关注研究的重点。在编纂态度上，张惠言辑《词

选》也没有朱彝尊编《词综》严肃认真。朱氏是严格按照治经史的学术规范来治《词综》的，而张惠言编撰《词选》时在选源上则没有朱彝尊那么较真于词作文献来源真伪。据台湾学者吴宏一考证：“张惠言《词选》系就朱彝尊《词综》改选者，故朱氏有错误的地方，张惠言大都沿袭下来。”^{[14][42]} 吴氏举出了《词选》诸多文献的失误之处，由此可见张惠言编纂是集不甚用心。在选目上，由于皋文推崇唐五代北宋词风，故而有所侧重，如温庭筠一个人就选了18首，约占总词量的16%，选词极不均衡。

《宋四家词选》系常州词派周济所编选的一个词学选本，在选阵上^②，以周邦彦、辛弃疾、王沂孙、吴文英四位宋代词人为旗手，领袖群伦，将另外47人附着在他们名下，共选词239首，此选词宗旨作者在前面的序论中亦有交代：“清真，集大成者也。稼轩敛雄心，抗高调，变温婉，成悲凉。碧山饘心切理，言近旨远，声容调度，一一可循。梦窗奇思壮采，腾天潜渊，返南宋之清泚，为北宋之秣摯。是为四家，领袖一代。馀子莘莘，以方附庸。”^{[15][205]} 《宋四家词选》中录周（26首）、辛（24首）、吴（22首）、王（20首）四人词作共92首，约占总数的40%，选词是有偏重的，并且在选源上，这个选本基本上也是以《词综》为本的^{[16][189]}。

通过对比我们可以发现，后两部词选有明确的宗主意识，选阵分布极不平衡，且不太注重选源的真伪，花费的时间精力与《词综》相比也不可同日而语。从《词综》与张惠言的《词选》及周济的《宋四家词选》的成书过程及选目对比来看，朱氏编选《词综》不仅仅是为了创派扬名，更有其存词存史的深层目的，这正是明清易代之际的学术思潮的反映。

二、《词综》编纂的学术态度与明清易代征实学风的转变

明清易代引起了汉族士子的强烈的震撼与反思，明代学术的空疏不实正是他们批判的对象。易代之际，学风由空谈义理转向经世与考据，学术态度的转变，逐渐改变了明代以来的空疏不学之风。朱彝尊山西游幕期间，曾广为考察金石碑刻，与史相参，匡谬指瑕，在治学方法上注重考证典章名物制度，其治学目的亦在于政治教化，这也被认为是对明末清初实学风气的回应^{[17][19]}。朱彝尊后来编选《词综》，就与他这种刻苦治学的学术态度密切相关。

朱彝尊等编选《词综》倾注了大量心血，是将其作为学问事业来做的。他们编选是书不是随便翻检一下词选及文人别集凑合而成，而是广泛稽考，翻检了大量文史材料精挑细选而成。据汪森《词综序》言他们编纂《词综》花了八年多的时间，观览宋元词集一百七十余家，参考传记、小说、地志三百余家，用功之勤可想而知。如其编选《词综》仅是参考的选本就数量可观。据朱氏《词综·发凡》所云，《词综》编选仅词学选本就参考了十四种，当时流传的主要选本皆囊括其中^{[12][11]}：

表 1 《词综》参考的词学选本

选者	选本
赵弘基	《花间集》
黄升	《花庵绝妙词》《中兴以来绝妙词》
陈景沂	《全芳备祖乐府》
元好问	《中州乐府》
彭致中	《鸣鹤余音》
凤林书院	《元词乐府补题》
许有孚	《圭塘欵乃集》
顾梧芳	《尊前集》
杨慎	《词林万选》
陈耀文	《花草粹编》
沈际飞	《草堂诗余广集》
茅映	《词的》
卓人月	《词统》

不仅如此，朱彝尊他们还翻检了大量丛书、稗史，包括宋人左圭所辑的《百川学海》，宋人曾慥所编的《类说》，宋人吴曾所撰的《能改斋漫录》，宋人阮阅编撰《诗话总龟》，宋人胡仔所撰的《苕溪渔隐丛话》，明人陶宗仪的《说郛》，明人冯梦龙编写的《古今小说》，明人钟人杰所辑的《唐宋丛书》，明人商濬的《禊海》，明人陆楫的《说海》等书，此外，据朱彝尊《词综发凡》所言，为了编选《词综》，翻阅的小说，都有十几家，即便是片词可佳，也要尽力搜罗，所以这个选本中存有诸多其他选本所不见的词作^{[12][12]}。真可谓网罗群书，用心勤勉。

从《词综》的选目来看，尽管在选词的审美取向上偏嗜醇正高雅，但各家基本上还是均有词作入选，并没有因为词学观念之不同而因词废人，这体现了朱氏保存词学文献、存词存人的编纂目的。朱彝尊在《词综·发凡》开篇就指出，自唐宋以降，作者一般把所作之词另行收录，而不入集中，所以词作相对于作者的其他作品，更容易散佚^{[12][12]}。因为唐宋时期文人并没有将词作视为流传不朽的作品，故而一般不编入别集，这样使得词作往往流失无闻，乃至失传，朱彝尊起笔言此，用意是很明显的，即欲网罗辑存词学文献。《词综》收词 2 253

首，但收词作较多的单个词人并不多见，据笔者统计，收入词作在二十首以上的仅二十一人，如表 2 所示：

表 2 《词综》收录词作二十首以上作者

入选词人	入选词作	入选词人	入选词作	入选词人	入选词作
温庭筠	33	贺铸	25	吴文英	57
冯延巳	20	周邦彦	37	陈允平	23
柳永	21	毛滂	21	周密	57
张先	30	辛弃疾	43	王沂孙	35
欧阳修	21	姜夔	23	蒋捷	21
晏几道	25	史达祖	26	张炎	48
秦观	20	高观国	20	张翥	27

这二十余人共选 600 余首词作，仅占总数的 28%，而绝大多数人一般只取一二首词，在宋词中无名氏的词作一次就录取了 45 首，可谓博采旁收。

清人纳兰性德曾这样评述《词综》：“近得朱锡鬯《词综》一选，可称善本。闻锡鬯所收词集，凡百六十余种，网罗之博，鉴别之精，真不易及。然愚意以为吾人选书，不必务博，专取精诣杰出之彦，尽其所长，使其精神风致涌现于楮墨之间，每选一家，虽多取至什至佰无厌，其余诸家，不妨竟以黄茅白苇，概从芟薙。”^{[18]533-534} 纳兰氏先肯定了朱彝尊《词综》网罗词集之广博及鉴别之精审，接着批评其选目芜杂，没有重点，没有体现“选”特色。在他看来，选本要“选”就应该选经典作家和经典词作，而不必面面俱到，“仆意欲有选，如北宋之周清真、苏子瞻、晏叔原、张子野、柳耆卿、秦少游、贺方回，南宋之姜尧章、辛幼安、史邦卿、高宾王、程钜夫、陆务观、吴君特、王圣与、张叔夏诸人，多取其词，汇为一集，余则取其词之至妙者附之，不必人人有见也。”^{[18]534} 纳兰氏认为操选政时选阵就是要重点突出，其余则可根据其作品之精粗酌情取舍，而不必逢人必录。纳兰氏批评朱彝尊《词综》“不必人人有见”，正从反面证实了朱氏十分明确的存词存史的意识，而决不仅是为了某种词学审美理想进行词作的遴选。晚清况周颐《词学讲义》指出，《词综》尽管以轻清婉丽为主旨，但是“凡所撰录古昔名人之作，往往非其旨者”^{[19]前言，13}，选作与选旨不符的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词综》编纂包含着选者的存词存史的思想。

为了尽可能选择收入更多词人词作，朱彝尊甚至一度放弃了刊刻《词综》的机会。据汪森的《词综序》所言，朱氏在选辑十八卷之后曾遇到汪森，两人曾经一起观摩研讨过这个选本，汪森其时建议将其刊刻，但是朱彝尊认为搜求未广，不宜刊行，并请求汪森帮忙搜集整理词作。三年之后，两人再次相遇，朱彝尊已经将选本扩充到二十六卷，汪森也广为搜求，

从各地藏书家手中广为搜罗，补充四卷，一共凑足三十卷。如汪森所言，他们总共观览宋、元词集一百七十余家，传记、小说、地志等史料三百余家，前后共花了八年时间^{[12]1-2}。嗣后汪森与周青士等人认为此书“挂漏很多……思补辑以成完书”^{[12]补遗后序, 5}，与诸人四处访书，于康熙三十年（1691）共得补遗六卷，得以完成现在所传的三十六卷本《词综》。

由朱氏等人花费这么大的精力来编纂一部选本，亦可看出其根本目的绝非一般意义的创立词派。四库馆臣亦认为《词综》编选有采集保存词学文献的目的，《四库全书总目·词综》条谓：“是编录唐、宋、金、元词通五百余家。于专集及诸选本外，凡稗官、野纪中有片词足录者，辄为采掇，故多他选未见之作。其调名、句读为他选所淆舛，及姓氏、爵里之误，皆详考而订正之。其去取亦具有鉴别，……以视《花间》、《草堂》诸编，胜之远矣。”^{[20]2806}其选源除了专集选本之外，还扩展到稗官野史之中，“有片词足录者，辄为采掇”，并且仔细甄别，严加考证，这种严肃的学术态度与严谨的考证方法也可见出《词综》决非一般意义上推尊某种词学风格和审美理想的词选。

三、《词综》编纂与明清易代注疏考证学术方法的转变

明代心学倡导明心见性，以义理为宗，托诸空言，清初征实学风回流，注重考证注疏之学。朱彝尊在《静志居诗话》中盛赞朱鹤龄“长于笺疏之学”，认为其《毛诗通义》《禹贡笺注》等书“发明宋儒集注集传所未及”^{[21]679}，其对注疏之学的肯定，以及对宋学的超越，正是对汉学的回归，因为推尊汉学，汉学的学术方法自然也会对他的学术活动产生影响。反观《词综》的编纂，可以看出朱彝尊等人正是以汉学的学术态度编纂《词综》，故其治词方法极为严谨，《词综》的编纂甚至采用了刘向校讎学的诸多方法，诸如备众本例，订讹误例，考作者例，及专人校专书等^③，方法的改进，极大提高了古典词学的研究水平。

先看备众本例。在编选张炎词作时，朱彝尊等人就选择了诸多不同版本参以对校，据《词综·发凡》所云，张炎的词集，有汪森所购的版本，还有宋萃等人的抄本，后来又参校了钱宫声的家藏本，钱氏藏本乃是陶宗仪手抄本，文献价值自不待言，而且这个抄本词作多达三百多首，其中诸多词作为朱彝尊等此前所未见^{[12]11}。由此可见，仅就张炎的《玉田词》而言，他们就至少参校了多种不同的本子，其严肃认真可见一斑。

再看订讹误例。由于受词为小道末技传统观念的影响，文人向来不重视保存词作，这使得词作流失不全，脱误甚多，给后人研治词学造成很大的困难。以校勘词籍著称于世的晚清词学大师王鹏运就曾坦言校词之困难，指出由于词体文学晚出，并受到诗尊词卑传统观念的影响，所以文人士子往往没有刻意保存词作，加之词体文学受到句有定字、字有定声这种体格的影响，方便按图索骥，使得文人创作过程中持有一种轻视的态度，“然其为文也，精微

要眇，往往片辞悬解，相饷在语言文字之外，有非寻行数墨所能得其端倪者，此其难也”^{[22]355}。这就加倍导致了校订词籍的难度。朱彝尊等在编订《词综》时便很注意校勘词作，订正讹误，据《词综·发凡》所云，史达祖的《绮罗香》一词中，“还被春潮晚急”一句本是六字句，但是《草堂诗余》的坊本掉了一个“晚”字，成了五字句，这个错误被其他版本因袭；而周晴川的《十六字令》中的“眠，月影穿窗白玉钱”一句，选本将“眠”讹为“明”，导致断句为“明月影”，真可谓错了一字，谬以千里；此外，欧阳修的《越溪春》一词的结语“沉麝不烧金鸭，玲珑月照梨花”，本来是两个六字句，但是因为坊本将“玲”字讹为“冷”字，“珑”字讹为“笼”字，于是词句被段为“沉麝不烧金鸭冷，笼月照梨花”，原意全失；此外还有苏东坡的《念奴娇》、汪彦章《点绛唇》、王晋卿《烛影摇红》、李后主《临江仙》等词作皆有讹误或失漏，朱彝尊等人皆依据史料笔记等文献将其订正^{[12]113}。朱氏在此举出的诸多讹误之处，并逐一订正，同时告诫后学注意考辨图谱，订正讹误，反映的正是其将研治经史汉学的方法运用到词学领域的态度。

再如考作者例。唐宋词家并没有把作词视作藏之名山的事业，填词还可能会影响作者的名声。如《北梦琐言》记载：“晋相和凝，少年时好为曲子词，布于汴、洛。洎入相，专托人收拾焚毁不暇。然相国厚重有德，终为艳词玷之。契丹入夷门，号为‘曲子相公’。所谓‘好事不出门，恶事行千里’，士君子得不戒之乎！”^{[23]47}和凝虽然厚重有德，可是自己的良好品行却因为写艳词而受到了影响。更有甚者，竟然利用艳词来打击政敌，搞党派政治^[24]，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些因素导致词人词作张冠李戴现象严重，词人姓氏里爵亦湮没无闻。故而朱彝尊等在编纂《词综》的时候注重考订作者作品，厘清讹误，正本清源。如其《词综·发凡》所指出的，历来词学选本中，选家关于词人的姓氏、官爵和乡里等资料的载录各有不同，例如《花间集》《中州乐府》等选本，先系官爵乡里，然后记录词人姓名；《绝妙词选》则把字书于官爵之下；《全芳备祖》则只书名，而《草堂诗余》则只书字；《凤林书院》把别字冠于姓名之前；杨慎的《词林万选》与陈耀文的《花草萃编》，有时书名，有时书字，有时书别字，或者书官爵等，不一而足，由于体例不统一，使得读者茫然不知所措；更有甚者，将朱敦儒的《樵歌》词集误为秋娘所作。正是因为词集词作讹误甚多，所以朱氏等人才严加考证：“是集考之正史，参以地志、传记、小说，以集归人，以字归名，得十之八九。”^{[12]12}通过考辨作者，厘正淆乱，论次体例，给词学研究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此外，在《词综》的编纂过程中，朱彝尊还注意聘请时贤同力协作。据《词综·发凡》记载，参与探讨编纂的人员除朱彝尊、汪森之外，还有安丘曹升六，无锡严荪友，江都汪季用，宜兴陈维崧，华亭钱葆酚，吴江俞无殊，休宁汪周士、季青，钱塘龚天石，同郡俞右吉、

沈融谷、缪天自、沈覃九、叶元礼、李武曾、李分虎、沈山子、柯翰周、浦傅功、周潜岳等共二十二人。朱彝尊很注意让学有专长的人发挥自己的长处，如让柯崇朴作考证工作，“是集考之正史，参以地志、传记、小说，以集归人，以字归名，得十之八九。论世之功，柯子寓匏有焉”^{[12]112}。又如让周青士考辨音韵字句，“周布衣青士，隐于廛市，于书无所不窥，辨证古今字句音韵之讹，辄极精当。是集藉其校讎”^{[12]112}。周青士即周筮，是一位博学多才之士，据吴熊和先生考证，他还参加过蒋景祁《瑶华集》编订，独立编选《今词选》十卷作为《词综》一书的续编，与柯崇朴共同编著《乐章考索》一书，著《词纬》三十卷，《今词纬》十卷，还与沈进、柯煜发起編集《绝妙好辞今缉》等^{[25]430-431}，正是因为周筮学识渊博，长于校勘，故而朱彝尊聘请他来做此项工作。这一点与汉人校书极其相似，如《汉书·艺文志》记载“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26]1701}用专人校勘专书充分发挥他们各自的特长。《词综》编纂充分发挥了学有专长之人的特长，对提高词学研究水平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四、《词综》编纂对清代词学研究思想方法的学术影响

朱彝尊以严谨的学术态度对待《词综》的编纂，为词学研究树立了典范，并影响到当时及后来的诸多词学研究者，对提高词学研究的学术水平起到了重要作用。如徐鉉在编订《词苑丛谈》时就曾受到朱彝尊的指导和影响，据其《词苑丛谈·自序》所言：“徐子之为《词苑丛谈》也，从无聊羁旅中，搜取乐章，可佐尊前酒边之所吐属也，拾残纸凸笔，随时随地书之。”^{[27]5}可见徐氏编纂是书起初并没有认真对待，聊以取乐罢了。可是后来遇到朱彝尊，其态度就不一样了。据其所言，在康熙十八年（1679）与朱彝尊、陈维崧一起校订词书时，朱彝尊告诉他，收集词学史料文献时，必须将书目出处旁注于下，要以严谨认真态度对待此事，而不要仿效陋儒抄袭前人遗说而据为己有，徐鉉深以为然，但是书稿已经完成付梓，难以一一追溯补订，只能根据记忆对部分材料加以补充注释，“然尤虑其择焉不精耳”^{[27]5}。徐鉉编订《词苑丛谈》由先前之游戏心态转变为后来的严谨治学态度，并忧心摘取不精，态度前后判若两人，此正是受朱氏之教使之然。

甚至嘉、道以后词家亦受朱彝尊等人的影响。如冯金伯在撰《词苑萃编》时亦坦言是受朱竹垞学术思想的影响，并援引朱彝尊指导徐鉉编订《词苑丛谈》一事为例，徐鉉虽然听从了朱氏的建议，但是书稿已经印行，无法一一追补，留下诸多缺憾，所以冯金伯在读《词苑丛谈》的时候，经常感觉序次错综，并多次计划重新编排，但是一直未能付诸实践：“甲子入秋后，枯坐于小舟，萧然无事，思了此愿。第家中书籍，未能捆载而来，此间又无书可借。惟先将原书细为整理，复就案头所有，再为补缀。因陋就简，仍复不免，然比原书删者十之

一，增者已十之三四矣。原书分体制、音韵、品藻、纪事、辨证，谐谑、外编七部，予于体制下增旨趣一部，一以溯其渊源，一以穷其阃奥也。……订正原书，并无创获。然引书必注，隶事有序，厘然秩然，俾观者快然有当于心，亦庶几为徐氏功臣云尔。”^{[28][1702]}冯氏条分缕析，引书必注，态度严谨，这固然与乾嘉严谨扎实的考据学风分不开，但朱彝尊在词学研究上导夫先路之功自不可没。如于翠玲所言：“朱彝尊将文献考据学的范围拓展到词籍选本，这对于清代词学研究的发展具有示范意义和引导意义。……《词综》已经是考证有据的文人读本和学术成果了。”^[29]将词学纳入学术研究的范围，用传统研治经史的汉学方法治词，体现了编者严肃认真的态度与严谨扎实的学风，这对推动清代词学的发展具有良好的引导意义和示范意义。所以态度严谨的四库馆臣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对《词综》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总之，朱彝尊等人编选《词综》，主观上是为了保存历代词学文献，但在编选时提倡醇雅词风，暗合了满清的文治策略，是时代的选择造就了朱氏的词学成就与影响。诚如严迪昌所言：“世称‘南朱北王’的朱彝尊、王士禛二位大诗人，朱竹垞以诗鸣于前，转而却以‘浙西’一派宗师称盟主于词坛；……‘神韵’与‘浙西’词派可以说就是适应时代需要的孪生物。是两位文学家自觉不自觉地顺应了统治意志和统治思想的需要。”^{[30][60]}因为时代的需要，加之后学的不断揄扬，将朱彝尊推上了浙西词派领袖的宝座。但作为朱彝尊个人而言，其编纂《词综》实际上深受明清易代经世学风的影响，存经存史思潮的熏染，及求实考据学风的推动等因素合力促成的。《词综》的编纂，一改往日视词为小道末技的轻视态度，以考证经史的学术态度来研治词学，提高了词学研究的学术品格，推动了古典词学研究的学理化进程，在词学学术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注释：

① “金源”，金国的别称，金代阿鲁图《进〈金史〉表》：“维此金源，起于海裔。”《金史·地理志上》：“上京路，即海古之地，金之旧土也。国言‘金’曰‘按出虎’，以按出虎水源于此，故名金源。建国之号，盖取诸此。”清代钱谦益《〈列朝诗集〉序》：“《中州》之诗，亦金源之史也。”

② 这里所说的“选阵”，即是词选所开列的词人名单与词作目录，这个词学概念由肖鹏先生总结提出，参见其《群体的选择——唐宋人词选与词人群体通论》，凤凰出版社2009年版，第18—20页。

③ 曹慕樊引近人孙德谦《刘向校雠学纂微》云孙氏将《别录》宗旨列为二十三项，重要的项目有备众本、订脱误、删复重、条篇目、定书名、叙源流、究得失、撮旨意、撰序录、辨疑似等，如备众本例即是用几种不同的本子对勘，择善而从，订讹误例即是订正文字脱误衍文，考作者例即是考证作者，厘清姓氏里爵等。参见曹慕樊《目录学纲要》，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4—27页。

参考文献：

[1]赵尔巽，等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7.

- [2]北京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79册[G].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
- [3]王利民.博大之宗——朱彝尊传[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
- [4]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 [5]元好问.中州集[M].北京:中华书局,1959.
- [6]钱谦益.列朝诗集[M]//四库禁毁书丛刊编辑委员会.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95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 [7]朱彝尊.明诗综[M].康熙四十四年(1705)六峰阁刻本.
- [8]祝东.从“诗史”到“词史”——论杜甫诗史观对清代词史观的影响[J].杜甫研究学刊,2015(2):95-102
- [9]朱彝尊.曝书亭全集[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
- [10]叶嘉莹.清词论丛[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
- [11]陈乃乾,编.清名家词:第1册[G].上海:上海书店,1982.
- [12]朱彝尊.词综[M].汪森,编.李庆甲,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 [13]张琦.重刻词选序[G]//正续词选.上海:大东书局,1933.
- [14]吴宏一.清代词学四论[M].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
- [15]清人选评词集三种[M].尹志腾,校点.济南:齐鲁书社,1988.
- [16]李睿.清代词选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6.
- [17]李瑞卿.朱彝尊文学思想研究[M].北京:京华出版社,2007.
- [18]纳兰性德.与梁药亭书[M]//通志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 [19]朱彝尊.朱彝尊词集[M].袁李来,点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
- [20]永瑢,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Z].北京:中华书局,1997.
- [21]朱彝尊.静志居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
- [22]施蛰存,主编.词籍序跋萃编[G].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 [23]孙光宪.北梦琐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 [24]谢谦.欧阳修艳词绯闻辨疑[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4):92-97.
- [25]吴熊和.吴熊和词学论集[M].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
- [26]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 [27]徐钊.词苑丛谈校笺[M].王百里,校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
- [28]冯金伯.词苑萃编自序[M]//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
- [29]于翠玲.论朱彝尊《词综》的文献价值[J].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5(5):24-31.
- [30]严迪昌.清词史[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